

# 唐绍仪与孙中山的交往

张晓辉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唐绍仪和孙中山都是广东香山县人, 属同时代的政治家。他们在民国初年曾共同为反对军阀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而携手合作, 同时在实现共同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上又存在着重大分歧, 以致最后在政治方面分道扬镳。但两人是君子之交, 并未反目为仇, 反而一直保持着私人的过从和友谊。

**关键词:** 唐绍仪; 孙中山; 政见分歧; 私人友谊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13(2009)04-0032-04

## 一、唐绍仪和孙中山合作的政治基础

追求自由平等与民主共和, 反对军阀专制独裁统治, 是孙中山(1866~1925)和唐绍仪(1862~1938)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 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有深刻的了解。唐绍仪早年“在美国留学, 素受共和思想”<sup>[1]</sup>。回国后沉浮于宦海, 脑中的民主共和思想被深深地封固起来。但辛亥革命爆发后, 唐开始了与孙的经常交往, 逐渐转向共和民主, 由清皇朝的一品大吏, 成为顺应民主潮流的开国功臣。

在辛亥南北和谈中, 唐绍仪虽为北方全权代表, 却倾心共和, 与孙中山、黄兴等推诚协商。唐对孙主张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表示赞成, 在整个和谈中都坚持共和的立场, 不惜违背袁世凯之旨意。据柏文蔚回忆说, 唐自孙介绍加入同盟会, “非常忠实”, 并向孙建议“用政治手法来对付袁世凯”。<sup>[2]</sup>出任民国首任总理后, 唐决心推行责任内阁制, 在同盟会阁员的支持下, 事事恪遵约法, 其内阁当时曾被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袁的分歧就产生在作为政府总统和总理是否遵守共和制度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 唐为捍卫责任内阁而不惧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民初反对袁世凯专制复辟的护国斗争中, 唐绍仪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站在一起,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 他便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通电讨袁

要其“宣布辞职, 以塞扰攘”<sup>[3]</sup>, 后又发出《忠告袁世凯退位电》。唐是上海反帝制派之中心人物, 策划反袁甚为努力。

袁世凯死后, 孙中山、唐绍仪共同反对皖系军阀操纵北京政府, 毁法专权。1916年7月初, 段祺瑞被迫同意恢复国会, 孙与唐两度参加了上海各界人士欢送国会议员北上复会的集会。翌年5月8日, 段指使军警组成所谓“公民情愿团”, 企图用武力强制议员通过对德参战案。孙、唐等多次联名通电北京政要和国会议员, 要求惩办“犯法乱纪”的滋事暴徒, 勿让肇事首恶逍遥法外;<sup>[4]29-32</sup>并坚决反对少数政客毁法, 以维护国会的尊严。

护法运动时, 唐绍仪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 是广州护法政府的主要成员之一, 以高票当选为财政总长。1919年第二次南北和议时, 唐绍仪被推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在一年多的和谈过程中, 始终维护护法旗帜。孙中山赞赏道: “此次上海和议, 唐少川主张颇为正大。粤中国会同人, 自宜一致赞助少川, 为其后盾。”<sup>[5]31</sup>

1920年, 唐绍仪应孙中山之命, 参加讨伐桂系军阀的二次护法运动, 列为四总裁之一(另两位是伍廷芳和唐继尧)。四总裁曾多次联合发表《移设军政府宣言》、《重申护法救国宣言》、《否认北方政府伪统一宣言》、《建设方针宣言》、《为粤军返粤平乱宣言》等, 密切合作, 活跃于政坛。翌年5月, 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成立, 军政府取消, 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歧逐渐凸显。唐携眷返回香山唐家湾故

里 或远走沪上 以避免正面冲突。

## 二、唐绍仪和孙中山的政治分歧

唐绍仪和孙中山在为实现共同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主要表现在：

(一) 唐绍仪企图组合稳健派的大政党 孙中山倡建新革命党

唐绍仪和孙中山的政见分歧可以追溯到袁世凯暴毙 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 国内政局发生转机。当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种倾向 一是追随孙中山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激进派人士 积极培养实力 待机讨伐北洋军阀 以武力夺取政权 一是在国会中原国民党的重要人物 主张利用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优势 与北洋派平分政权。唐绍仪有意实行议会政治 故被后一类人士拥为领袖。

1916年下半年旧国会复会后 国民党议员(包括中华革命党人在内)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 他们纷纷提议恢复旧国民党。10月13日 孙中山致函全国同志 表示“为党务扩张计 应徇众议 为复党之准备”<sup>[19] 377</sup>。孙中山信任唐绍仪 委托其主持复党工作。<sup>[4] 6-7</sup>但二人在如何组党的问题上却有不同见解 孙主张用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原则和革命精神改组和整顿旧国民党 而唐则倾向于组合旧国民党人从事议会政治。此外 旧国民党内派系复杂 相互争斗 如跻身内阁的谷钟秀、张耀曾等政学会骨干分子极力排挤中华革命党人。唐居间调和 企图使党内各派势力合组为新的大政党 未能成功。

后在广州护法运动国会中 国民党内形成以唐绍仪为领袖的益友社、以孙中山为领袖的民友社及政学会等三大派。益友社实力居各派之首 欲筹组一大政党 企图推唐绍仪来负责 孙中山、岑春煊、冯国璋为理事。唐本人则“大有勇于负责之概” 他甚至打算取代孙而执掌国民党。<sup>[7]</sup>岂知 1919年10月10日 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名称前冠以“中国”二字 以示与旧国民党之区别)在孙中山的主持下正式成立 唐的政治抱负遂致落空。

(二) 唐绍仪寄希望于调和立国 孙中山坚持与南北军阀不懈抗争

孙中山始终坚持革命斗争 而唐绍仪无论对于内部争斗和南北对峙之重大问题 基本态度均为“调和”与妥协。

1917年7月3日 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护法会议 提议复设临时政府 因唐绍仪等反对而被否

定。随后 在组织护法政权的实质问题上 各派动机迥异 暗中争斗不已。控制广州的桂、滇实力派 主张仿效护国战争时期的军务院 采取合议制 按各方实力排座次 得到唐绍仪等人的赞同。<sup>[8] 270-271</sup>

9月10日 广州军政府成立 孙中山宣誓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而被任命为军政府元帅的陆荣廷和唐继尧迟迟不愿响应。在此政治矛盾的漩涡中 唐绍仪既不赞同孙中山的主张 也不愿附从西南军阀排斥中华革命党人 于是回乡隐居。

翌年1月中下旬 桂系控制的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召开 形成与军政府对峙的阵势 唐绍仪等不顾孙中山的极力反对进行调和。桂系后又策动某些国会议员提出改组军政府之方案 要点即在取消孙的大元帅职务 改行护法各派首领并列为政务总裁的合议制 以达平分政权、篡夺军政府领导权的目的。唐致力于以合议制制衡各派权益 故仍取调和立场予以支持 并向孙斡旋 遭到拒绝。

1920年孙中山决定武力驱逐桂系后 唐绍仪仍不忘对内调和 先后致电军政府总裁林葆懌和云南督军唐继尧 主张“欲求御侮之方 须先息阅墙之衅” 感叹西南内部“分崩离析 同室操戈 军府失其效用” 不加区别地指责“彼此已各走极端 势复不能相下 结果恐四分五裂 各败俱伤 徒使北方坐收渔人之利”。<sup>[9]</sup>

(三) 唐绍仪醉心于“政党政治” 孙中山欲以非常手段建立政权

在通过护法而计划达到的政治目标上 孙、唐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前者不惜以非常手段建立激进的革命政权 后者主张通过“政党政治” 以与北洋军阀平分政权。

唐绍仪一贯重视国会问题 力主召集正式国会 否定北洋军阀的毁法行为。他既反对北京政府的军人专政 也不同意孙中山主张的武力北伐 认为单凭武力不可能打倒北洋军阀和统一全国。

孙中山回粤再次重建政权后 总结了护法失败的教训 坚决主张在广州设立正式政府 “开一新纪元 巩固中华民国基础 削平变乱”<sup>[9] 450</sup>。当徐世昌非法充任北京政府大总统后 孙更决心出任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与之对抗 但遭到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等实力派的强烈反对 唐绍仪的态度也发生明显的变化。据历史档案记载 孙中山出任大总统 “少川反对在先”<sup>[8] 212</sup>。唐历来就不同意孙中山等人组建与北洋政府相对峙的革命政权 现主

张政务会议采合议制 不设主席总裁。但孙却提出立即召开非常国会 选举非常大总统 出兵北伐。这样 他们的分歧便公开化和表面化了。唐绍仪认为选举总统和出兵北伐的条件均不成熟 北方总统非法 南方决不能做出不足法定人数而选举总统的事。此外 唐坚持认为中国民主政体应实行“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并有意出面组阁 而孙坚持出任非常大总统 与其理想发生冲突。

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唐绍仪久未表态。广州正式政府成立后 唐被任命为财政总长 仍称病拒不履职。

(四) 唐绍仪憧憬联省自治 孙中山改行“以党治国”

粤军驱桂返穗后 孙中山和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陈炯明在革命发展道路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孙“欲得粤为根据地 群策群力 以成戡乱之功 完护法之愿”<sup>[10]549</sup>；陈“主张实行联省制度 各省制宪 共发展其民治精神 以图邦治”<sup>[11]</sup>。在政治主张方面 唐绍仪是站在陈炯明一边的。北伐护法和联省自治 实属革命与改良之争 以此为焦点 孙与陈、唐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日见显露 矛盾愈演愈烈。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 唐绍仪仍坚持认为只有联省自治才能取得国内和平 实现统一。于是离粤到沪 与章太炎等人一起从事“联治”的宣传。1923年8月初 唐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谓“吾人之惟一计划 即在合各省而为联邦”。他认定：“推翻军阀 不必由于革命 用人民坚定之志愿 以及和平合法之方法 亦属已足 盖中国人将不再参加于革命也。”<sup>[12]</sup>

国共合作建立后 孙中山从信奉自由民主思想转变到主张高度纪律性和高度集权化的“以党治国”，唐绍仪再也无法理解和接受。孙顾及多年的交谊 曾派人对其进行说服争取 但遭到拒绝。1924年2月 孙中山臧否人物 说唐“虽野心勃勃 然利欲之念 好色之情甚盛 不足以集众望”，将其视同段祺瑞、徐世昌等类 “均属过去之人”。<sup>[13]</sup>唐则连续发表言论 不赞同国民革命。

### 三、唐绍仪和孙中山的私人友谊

唐绍仪和孙中山是君子之交 虽最终在政治方面分道扬镳 但并未反目为仇 而一直保持着私人的过从和友谊。

#### (一) 难以隔舍的乡谊友情

唐绍仪和孙中山都是广东香山人 这是他们在从事民主共和运动中培育私谊的有利因素。辛亥南北和谈时 唐与孙在上海初次相见 因“同乡里 彼此一见 以乡音倾盖 握手称中山 似故交”<sup>[14]</sup>。从此以后 两位政治家之间开始了经常的交往。

关心乡里、反对军阀的残暴统治 更增进了唐绍仪和孙中山的乡谊友情。如1917年6月16日 唐绍仪等粤籍国民党人致电北京政府 历数袁党余孽粤督龙济光之劣迹 得到孙通电支持 赞“唐绍仪等请除龙济光电 实为天下公言”<sup>[6]314</sup>。1920年6月3日 孙、唐等四总裁联合发表《移设军政府宣言》，历数了桂系军阀统治广东的罪状。<sup>[5]268</sup>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 常以粤籍同乡情谊争取上海潮州帮工商业者的支持。这年11月 孙携伍廷芳、唐绍仪等会见了上海潮州会馆三帮董事会的代表 认真听取他们反映桑梓疾苦。<sup>[15]</sup>

#### (二) 政治家间的君子之交

如前所述 在民初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 孙中山与唐绍仪主要是携手合作的。在处理内部关系时 他们亦时常相互支持。如护法运动时 南方阵营内派系林立 矛盾极为尖锐激烈。政学会附从桂系 远交直系军阀 攻讦唐绍仪。民友社素与益友社作对 亦与政学会呼应攻唐。1919年2~3月 经孙中山多次劝阻后 民友社中的拥孙派遂转变态度 但以孙洪伊为首的一派人却加紧与政学会携手反唐 孙中山因助唐氏而与孙洪伊断绝关系 以致民友社公开分裂。20年代军政府恢复之初 在内部日益尖锐的矛盾中 唐绍仪虽竭力折衷各方 对孙中山仍有所偏袒。如孙科接任广州市长后 制定了若干市政条例 遭到陈炯明亲信广东省议会议长钟声等的暗中抵制 企图藉此夺取市政大权。孙科呈请军政府政务会议审核 唐绍仪、伍廷芳表示支持 钟声等的阴谋受挫。<sup>[8]212</sup>

即便是后来孙、唐在政治上渐行渐远 亦未反目为仇 采取极端行为。如陈炯明叛变控制广州后 即派部下去香山邀唐绍仪回穗维持局面 国内舆论亦支持唐出山。1922年7月 上海广肇公所特别召开会议 决定请唐“出维局面 以弭兵祸”，会后分别向各方发电 提出调解粤局之条件。<sup>[16]</sup>唐虽曾犹豫不决 但出于种种考虑 终未应允。

孙中山逝世后 唐绍仪于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孙的敬意。如在上海隆重举行的追悼会上 唐亲任“主祭”，会场壁间挂有其与章太炎等的挽联。<sup>[17]</sup>他

派儿子唐榴亲往北京守灵致唁，还与章太炎发起组织民间纪念会，自任总干事。在对报界发表的谈话中，唐推崇孙在中国民主运动的首要地位，说“中山先生一生，从事于民治政府之运动，今遽逝世，全国当同表哀悼。余与中山先生同省同县，余等相识，已四十年，及民国肇元，余等当相共事。革命势力之所以臻于强健，与舆论之所以集中于民治运动，要以中山之力为多”。当然，唐并不掩饰与孙的政治分歧，认为孙“似近急躁”，犯了不少错误，以致民主运动未能获得成功。他表示：“吾人于哀悼中山先生之际，尤应注意一事，即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治主义之奋斗者，其他各种之对人问题及意见之争论，均不必记忆。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此种思想，已深入全国人心。”<sup>[18]</sup>

### （三）共同缅怀早期革命志士

在艰苦的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孙中山和唐绍仪与许多志士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亦共同追悼和缅怀其中已逝世的重要人物。如1916年5月18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上海遇难。翌年5月1日，唐绍仪与孙中山等10人作为主丧友人，亲为陈氏发布举殡讣告。<sup>[4]28</sup>同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孙中山与唐绍仪作为其友人代表，发出“黄兴逝世通告”，谓“民国肇建，失此柱石，公谊私情，曷胜感恻！”<sup>[6]384</sup>次月20日，联合致函北京各政要，盛赞黄氏“勋绩烂然，固国人所共钦”<sup>[9]388</sup>。还以“主丧友人”名义，发布为黄出殡通电，并作祭文，以奠其灵。1921年1月23日，唐绍仪与孙中山、伍廷芳、唐继尧共同发表了《祭朱执信文》。

山田良政乃孙中山的日本好友，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幸牺牲，孙深为悼惜，誉其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sup>[10]235</sup>。1919年9月13日，唐以孙对山田氏的评价为主体，亲笔撰写《山田良政墓碑铭》。墓碑铭文笔流畅，一气呵成，颇能反映唐的精神面貌和政治观点。碑文中对社会革命方面的论述，亦有其独到的见解。

### （四）恪遵中山遗教主政模范县

唐绍仪于1929年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后又兼任中山“模范县”县长，致力于乡梓建设。他欣然出任此职，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其与孙中山的私谊。唐与孙为同乡，又共事多年，虽有政治分歧但未影响私交。孙去世后，唐还常探望孙夫人卢慕贞，时而接卢氏到其私人花园——共乐园小住。唐与孙中山儿子孙科过从亦甚密切，后者在设

立中山模范县的问题上，曾去信征求过唐的意见。唐绍仪当时已年近70，怀着建设孙中山故乡的感情，又秉承了孙科的意志，一口应承回任中山县。原因之二是唐素有致力于家乡建设的愿望。早在1920年时，他就对孙中山提出过在香山县设立“模范县”的建议，而现在能主政中山，正好遂其愿望。在唐家湾乡亲的欢迎会上，唐演讲道：“总理为柱石，我们为砖瓦木碎，我们建造一所房屋，柱石固然是重要材料，砖瓦木碎也不能不需要。建国纲领，以县为自治单位，我们砖瓦木碎材料，正合在一处建筑起来，为县自治努力。”他希望“以二十五年时间，把中山建设妥当”。<sup>[8]200-201</sup>唐绍仪在中山县的治绩颇为卓著，短短几年间，实业、教育、文化、交通等均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受到时人的赞扬。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八)[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8.
- [2]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G]//近代史资料:总第40号.北京:中华书局,1979:26.
- [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02-303.
- [4] 孙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 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 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7] 吴景濂函电存稿[G]//近代史资料:总第42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59-70.
- [8] 珠海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唐绍仪研究论文集[G].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 [9] 唐绍仪发电稿[G]//近代史资料:总第5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94-195.
- [10] 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1] 段公章,倪俊明.陈炯明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925.
- [12] 广州民国日报[N].1923-08-02.
- [13]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534.
- [14]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G]//近代史资料:总第53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79.
- [15] 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45-146.
- [16] 申报[N].1922-07-13.
- [17] 申报[N].1925-04-12.
- [18] 申报[N].1925-03-14.

南人民出版社, 2000: 33.

[ 7 ] 西盟王公会议招待所. 西盟会议始末记 [ Q ]. 内部印

[ 6 ]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刷本, 1913: 41.

90.

## Integration of the Pluralistic Chinese Nation

*TANG Ming-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nscious national entity has exi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ough the term Chinese nation just appeared amid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powers in modern times. The history of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as the historical choice of all the nationalities. There has been a long-lasting internal cohesive force between the 56 Chinese nationalities which share generalities, glories and shames, and are interdependent on one other as an integral whole.

**Key words:** the Chinese nation; the Han nationality; minority nationalities; plural entity

[ 责任编辑 朱 涛 ]

[ 上接第 35 页 ]

## Tang Shaoyi's Associations with Sun Yat-sen

*ZHANG Xiao-hu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ang Shaoyi and Sun Yat-sen, both natives of Xiangshan County, were statesmen of the same time perio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they cooperated to oppose the warlords' tyranny and defend democracy and the republic;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d hu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the means and ways of achieving their common goal and ended up breaking up. But the two were gentlemen and maintained their honorable personal friendship.

**Key words:** Tang Shaoyi; Sun Yat-sen; differences in politics; personal friendship

[ 责任编辑 文 俊 ]

[ 上接第 38 页 ]

## Liao Zhongkai's Thought on and Practice in the Principle of People's Livelihood

*ZENG Xue-L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Zhongkai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225, China)

**Abstract:** Liao Zhongkai in his later years offered a number of incisive insights into China's problem of people's livelihood. He believed the problem was the result of class oppression and eliminating political obstacles was the prerequisite to its solution; socialism wa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resolve the problem; land ownership was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the ultimate resolution depended on the masses of farmers and workers themselves. These ideas can still be drawn on in our efforts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Key words:** Liao Zhongkai; the principle of people's livelihood; practice

[ 责任编辑 文 俊 ]